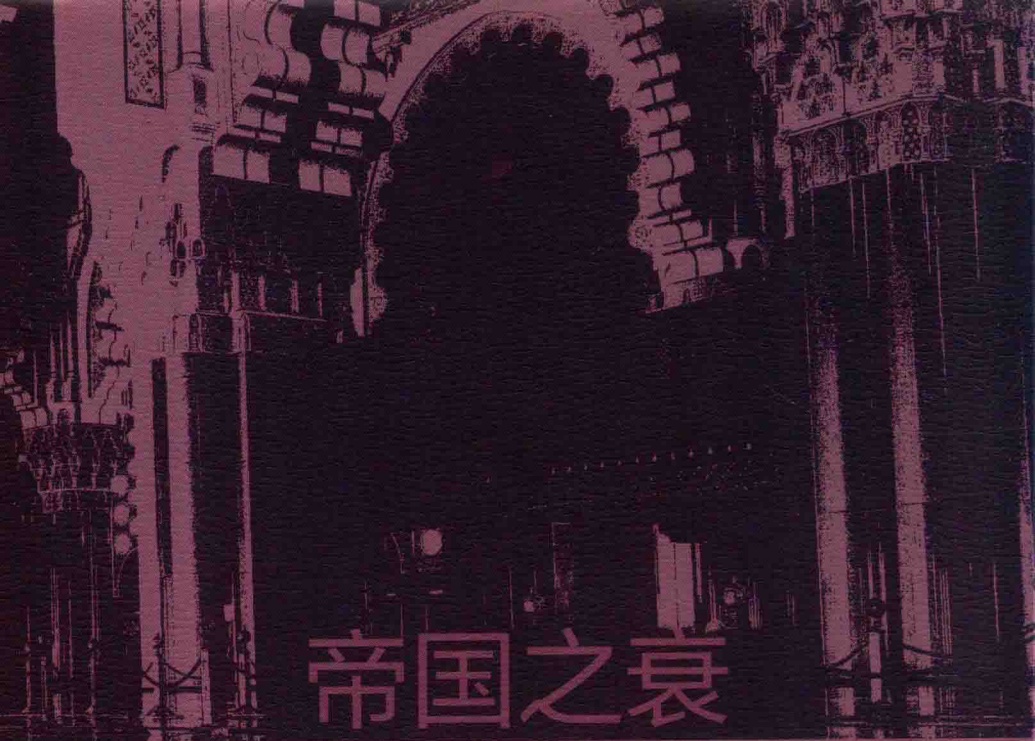




帝国之衰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史，不仅关乎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起点，

还涉及近代欧洲大国的外交及国际关系史。

这个帝国浮现的危机及其特点，

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历史参照。

奥斯曼帝国史六论

王三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帝国之衰

奥斯曼帝国史六论

王三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 / 王三义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0
ISBN 978 - 7 - 5201 - 3163 - 6

I. ①帝… II. ①王… III. ①奥斯曼帝国 - 历史 - 研究 - 1792 - 1918 IV. ①K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8883 号

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

著 者 / 王三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郭白歌

责任编辑 / 孙美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5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9.125 字 数：211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163 - 6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大学世界史高原学科
建设经费资助

自序

研究“奥斯曼帝国史”是有难度的。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面积最大时有400万平方公里以上，是今天西亚、东欧、北非二十几个国家的领土总和，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如果说把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算作帝国的形成，到1918年帝国解体，奥斯曼帝国前后有465年的历史。如果从1299年奥斯曼埃米尔国的建立算起，到1922年最后一位苏丹被废黜，早期国家史和帝国史加起来有623年。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关键是其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教派多，帝国留下的资料庞杂，涉及的语言种类多，很不容易理解和把握。面对这个望而生畏的“研究对象”，常常让人想起“盲人摸象”的寓言。一般情况下，要么做帝国通史一类的浮泛介绍，要么是做具体的专题研究，做得好就是打几个“深井”，成为系统研究的基础；做得不好，就是零敲碎碰，几乎可以算“添乱”。

本人是起步较晚的研究者。2002~2005年，以“中东近代经济转型（1809~1938）”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初次接触晚期奥斯曼帝国经济方面的内容，后来的研究，或者着眼于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西亚、北非，或者局限于晚期奥斯曼帝国衰亡的过程。虽没有离开这一领域，但研究的功力尚浅，成果有限。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晚期奥斯曼帝国（1792~1918）研究”时，原计划完成12章，最后统稿时发现，其中十章内容构成一个整体，另外两章的体例则完全不同，无论如何

没法放进去。从篇幅来说，十章内容已达到36万多字，只能考虑删减这两章。摘出的这两章中，一章专门讨论奥斯曼帝国的外债问题，一章专门讨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笔者就帝国外债问题，相关内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做过一次学术报告，听取了同行专家的意见，修改成一篇论文发表。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作为课题来写时是按国别的，如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关系、与俄国的关系、与德国的关系等，字数较多，后来提取主要观点修改成一篇一万余字的文章发表，其余3万字搁置于文档中。早先，笔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有兴趣，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涉及西化改革对少数民族地位的影响，另一篇探究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与演变。关于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构成及其特征，还有一万余字的文稿留存。这些都是现成的旧稿（已发表和未发表各占一半）。从2012年课题结项到2016年申请新课题，四年的“间歇”中笔者主要的研究涉及帝国的边疆问题、帝国的教育和社会风气变化问题、帝国的遗留问题，有一些新稿的积累（约10万字）。把手头的所有文稿集中起来，总共有六个专题：“民族问题”“外债问题”“边患问题”“对外关系”“世风之变”“遗留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以专题形式把这六部分内容铺开，形式看起来有点“散”，实际上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奥斯曼帝国由衰落到解体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到重要作用？换言之，本书从不同层面揭示奥斯曼帝国分裂和瓦解的根源、伴生条件，以及帝国瓦解的深远影响。

对这六个专题涉及的问题，有必要做一些阐释。

其一，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危机。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国家衰弱、

民族矛盾尖锐时，出现民族分离倾向，若有国外势力的挑唆，民族、宗教矛盾会演化为内乱甚至战争。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危机之一就是民族危机，直接的结果是行省独立和属地脱离。自1830年希腊独立，到1913年巴尔干诸国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疆域逐渐缩小，人口和可供支配的资源不断减少。那些追求独立的民族，最终还是先后脱离了帝国。有的是以民族独立的旗帜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主动脱离帝国，有的是接受欧洲大国安排，按照国际条约取得独立，还有的直接被欧洲国家占领。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的独立是这些民族主动寻求独立，得到欧洲大国的支持，最后脱离奥斯曼帝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是被大国占领而脱离奥斯曼帝国。

有果必有因。民族问题虽然复杂，但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往往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动因。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是帝国晚期社会变革的受益者，其经济影响力明显高于土耳其和阿拉伯穆斯林。奥斯曼政府的西化改革倡导民族平等，为少数民族争取独立提供了机会。例如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活跃于新兴的商业和金融领域，他们寻求自治或独立，实际上受到新政策鼓舞。当然，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构成分裂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力量。不可否认，欧洲大国的干预加快了少数民族脱离帝国的步伐。到19世纪中后期，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不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其二，外债问题与帝国的依附。

奥斯曼帝国并非因为外债而亡国，但从外债问题着眼来审视这个伊斯兰帝国，可以弄清它的衰弱、它的危机，及其瓦解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奥斯曼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被迫举债，而不

同时期举借外债的规模有大有小，多年债务累加，无法偿还。为清偿债务，1881 年成立了帝国公债管理处。这个机构化解了帝国的外债危机，但伴随其职能的扩大，成为奥斯曼帝国政府离不开的财政机构，即影响了帝国经济（尤其帝国政府的经济管理），也削弱了帝国臣民对土耳其统治者的忠诚。

从另一个角度看，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起初主动寻求西方帮助，后来是西方国家大规模的资本输入，看似把奥斯曼帝国引向经济依附的道路，实际上是阻止了这个帝国一路下滑的趋势。当然，奥斯曼帝国的开放伴随着“依附”。奥斯曼帝国处于西方支配下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为了对付俄国和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最先寻求普鲁士、瑞典的帮助，继而寻求法国、英国的帮助，后来不再信任英国和法国，转而寻求德国的帮助，从德国获得大量的援助（包括修筑铁路、改善军队装备等）。奥斯曼政府对德国的依赖增强，其后果是被德国拖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三，帝国边疆治理的难题。

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但帝国被地中海、黑海、红海分割，边境线不是一个完整的闭合曲线，边疆领土呈现支离破碎的形状。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相连，距离首都伊斯坦布尔很近，但历史上土耳其人并未完全控制爱琴海，爱琴海南边岛屿归属不定。土耳其人把势力延伸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但与西班牙、法国的长期冲突，使那里成了遥远的移动边疆。黑海以北的领土被俄国占领后，奥斯曼帝国北疆门户大开、干戈不休。巴尔干半岛上的属地和属国因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靠近奥地利和俄罗斯，大小矛盾和冲突从未间断。在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北部非洲，帝国的边界线从未明确划定，沙

漠部落与奥斯曼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多变，边疆治理一直是很大的难题。奥斯曼政府对属地管辖相对松散，帝国的政治结构僵化，属地的正常利益诉求不能及时上达。在国家机器强大时，属地不敢反抗素丹政府，当素丹的权威下降、帝国的军事力量衰弱时，维护边疆的安宁和稳定就不容易。又由于行省和属地之间的联系不紧，各地发展不平衡，治理的程度有差异，一旦属地出现问题，中央政府往往顾此失彼。

其四，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过程，就是不断侵占拜占庭领土，吞并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并逐步控制东地中海的过程。所谓“对外关系”，主要是和欧洲国家的争夺战。1699年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奥斯曼土耳其人由进攻转为防守，且节节败退，被迫与欧洲大国在谈判桌上谈割地赔款的问题。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表面上始终维系着主权，英国和法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逐渐缩小，最终退出了东欧和北非。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中有四个主题：一是与俄罗斯持续的战争；二是与英国和法国的“相互需要”；三是行省和属地脱离的无奈；四是靠近德国获得的好处。希腊独立削弱了奥斯曼帝国，也埋下了后来的巴尔干危机的引线；埃及与奥斯曼帝国两次战争，既打击了奥斯曼帝国，也改变了近东均势，为英、法等国进入东地中海准备了条件。此后的苏伊士运河问题、近东危机、埃及奥拉比起义，每次都有欧洲大国干涉。在《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一书中，关于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关系有一个判断：“19世纪欧洲大国插手奥斯曼帝国事务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抵制俄国，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领

土和主权完整，但 20 世纪初期大国的插手，无疑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其五，西化与帝国的社会风气变化。

广义的“西化”，奥斯曼帝国较早。18 世纪前期奥斯曼上流社会开始学习西方人的消费和娱乐方式。在帝国历史上有名的“郁金香时代”（1703 ~ 1730），艾哈迈德三世不仅倡导学习西欧文化，翻译书籍，还仿照法国的建筑风格在托普卡帕宫门外修建了喷水池。至于引进栽种荷兰郁金香，早已被作家们铺陈和渲染。在 19 世纪的西化改革中，素丹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阿齐兹等除了推行各项改革，还大兴土木，修建新宫殿，建造凯旋门。作为时尚，达官贵人和富裕市民的家里摆上了欧式家具和生活用品，室内装饰采用法国风格。上流社会喜欢邀请西方享有盛名的画家，来为达官贵族及其家属画肖像。法国、意大利的歌剧、音乐和各种表演也流行于帝国境内的大城市。政府各部门的大小官员戴着菲兹帽，穿着欧式的马靴、黑皮鞋、礼服大衣。服务人员也穿着整齐的西式服装。不少官员能说英语、法语或德语，娴熟地与西方人打交道。穆斯林喜欢过有秩序的、安静的生活，土耳其人谨慎、注重维护隐私、不张扬、礼貌，总喜欢优雅地捧着水烟管，斜靠着吸烟。但当欧洲的时尚和消费方式“袭来”时，土耳其人这些旧习惯和生活方式很快就改变了，统治阶层、富裕阶层弃旧图新的态度出人意料。

关键是西式教育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大量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现，阅读本身带来的变化更大。19 世纪后期，随着土耳其人去西欧各大城市参观、学习人数的增多，学法语和英语的土耳其人越来越多。土耳其的青年人模仿法国诗歌、艺术，钻研西方哲学，也仿照西欧上层社会的方式组织沙龙，建立民间

团体。不仅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法国人的礼仪，甚至连法国的自由主义也在奥斯曼社会流行。由于识文断字的人增加，青年人知识水平的提高，有条件接触西方的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社会风气由浅层的消费和娱乐方式的改变，深入教育和文化层面并不断取得进步。

其六，帝国的遗留问题及其影响。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许多“遗留问题”成为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负资产。这些遗留问题包括海峡主权问题、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民族问题，一度成为共和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为此，领导人凯末尔和伊诺努花费很大精力去解决。土耳其与希腊的边界和人口问题，到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根据《洛桑条约》交换人口之后告一段落，后来的纠纷长期延续（比如塞浦路斯的希土矛盾）。土耳其和伊拉克的两国边界是在1926年签订《摩苏尔协定》后土耳其和英国协商解决的。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界划定，从1921年的《安卡拉协定》一直拖延到1939年，亚历山大勒塔州由独立最后划归土耳其，问题才得以解决。奥斯曼帝国的“遗留问题”中最为棘手的一个是海峡主权问题，根据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政府才收回海峡主权，真正实现了主权统一保障了帝国安全。至于库尔德民族问题，酿成了1925年的赛义德起义和政府镇压，并成为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总体而言，本书的六个论题是晚期奥斯曼帝国衰落到瓦解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但还不是全部。本书的研究在阐明史实的基础上，探究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不同层面的细节，力图澄清晚期奥斯曼帝国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都和奥斯曼帝国有关，

或者是因为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而引发的。研究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史，不仅涉及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起点，涉及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巴尔干地区基督教国家（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或属地）的根基或起点，还涉及近代欧洲大国英、法、俄、德等国的外交以及国际关系史。这个帝国出现的危机及其特点，帝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既有经验和总结，也有教训可吸取，可以为现当代大国治理提供历史参照。

国外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成果较为丰富，英、美、法、意等国都有研究机构，西文著作极为丰富，土耳其本国和部分阿拉伯国家也出版了不少著作。相比之下，我们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还欠缺。为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和讨论很有必要。但奥斯曼帝国史资料浩如烟海，作为研究者，对奥斯曼帝国史的探究只能触及某一个层面、某一类问题，难以把握全部内容。拙著《晚期奥斯曼帝国（1792 - 1918）研究》只勾勒晚期帝国演变概史，对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论述（帝国的衰落、帝国的西化改革、属地的丧失、哈米德二世的统治、第二次宪政等），仅仅是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阶段性成果。本书是探讨晚期奥斯曼帝国史的继续尝试。

目 录

自 序	001
-----------	-----

论题一 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与“民族问题”

一 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	002
二 少数民族与帝国的社会变革	022
三 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与演变	035

论题二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外债问题”

一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外债问题	055
二 公债管理处及其影响	070
三 外债问题与帝国的危机	077

论题三 奥斯曼帝国的“边患问题”

一 帝国的领土与边疆	087
二 地中海的争夺和消耗战	092
三 东部边境和北疆战事	103
四 阿拉伯行省沙漠地区的“边患”	109
五 欧洲边境的内困外扰	113

论题四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对外关系”

一 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关系	121
二 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关系	137
三 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关系	148
四 奥斯曼帝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	158
五 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演变的特征	167

论题五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与“世风之变”

一 穆斯林生活习俗和娱乐方式的改变	176
二 新式学校与帝国官方教育	188
三 阅读带来的改变（与福特纳教授对谈）	202

论题六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遗留问题”

一 海峡主权问题	220
二 领土归属和边界问题	232
三 库尔德问题	252

主要参考文献	262
--------------	-----

论题一 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与 “民族问题”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包括巴尔干地区、安纳托利亚高原、亚美尼亚高原、肥沃新月地带、汉志和也门、埃及至阿尔及利亚等地。庞大的帝国内，除了鲁米利亚、埃迪尔内、阿勒颇、科尼亚、巴格达等数十个行省，还有克罗地亚、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等属国。帝国境内的民族成分多，宗教派别复杂。大体来说，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可分为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两类，按照信仰，可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少数民族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库尔德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等。奥斯曼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等信仰伊斯兰教，是穆斯林，而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还有犹太教徒等统称“非穆斯林”。

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动中，民族因素是不是一个突出的因素？这一点是需要讨论的。少数民族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中是积极的推动力量还是阻碍力量？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同的观点。尽管奥斯曼帝国有数十个少数民族，但在帝国经济领域里起主导作用并支持奥斯曼帝国改革的，主要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不可否认，18、19 世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但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是出于对帝国统治的不满，还是国外分裂势力的挑唆和欧洲大国的干涉？具体情况还得具体

分析。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衰败，少数民族自身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政治地位是提高还是降低？造成少数民族群体与土耳其统治阶层的对立，是政府政策的失误还是其他原因？亚美尼亚人问题的形成与演变，是否反映出帝国国内民族关系紧张？其影响为什么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范围。亚美尼亚人的自治要求，是属于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还是被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利用？这些问题需要仔细分析。

一 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穆斯林民众占多数，非穆斯林属于少数。作为统治阶层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起源于中亚突厥部落，皈依了伊斯兰教，占领安纳托利亚并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建立了新兴帝国，征服了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奥斯曼土耳其人居于帝国政治大厦的顶层。素丹和大多数高级官员均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担任，高级军官也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中的普通民众，主要是士兵和农牧民。奥斯曼土耳其人享有政治特权，其地位高于帝国内的其他民族群体。阿拉伯人是奥斯曼帝国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构成穆斯林的主体，生活于叙利亚、巴勒斯坦、汉志、也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广阔的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在宗教界占有重要地位，但仅有少数阿拉伯人进入高级官员行列。因为是被征服的民族，阿拉伯人的政治地位低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普通阿拉伯民众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处于被统治地位。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穆斯林，比如，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的库尔德人，还有改变原来的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犹太人或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库尔德人以游牧和农耕为主，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这

种类型的穆斯林所占比例不大。

既是“非穆斯林”群体，也是少数民族，并在奥斯曼帝国占有重要经济地位的，主要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黎凡特地区的天主教徒等，他们也在奥斯曼帝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等少数民族在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不突出。奥斯曼帝国内，1800 年仅大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为主）就占帝国总人口的 10% 以上。当时帝国总人口有 2400 万人^①，大叙利亚的基督教徒超过 240 万人，而安纳托利亚、鲁米利亚、埃及和伊拉克均有基督教徒，总计数百万人（1829 年希腊独立，75 万希腊人脱离奥斯曼帝国）。19 世纪 70 年代，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等独立，基督教徒的数量减少（帝国总人口也随之减少）。

按统计数据，1883 年帝国境内的希腊基督教徒约 232.9 万人（留在帝国的希腊人），占总人口（约 1737.5 万）的 13.4%；亚美尼亚基督教徒不到 99 万人，占当时帝国总人口的 5.7%；犹太人总数为 18.4 万余人，占总人口的 1%。1897 年帝国内希腊基督教徒约 257 万人，占总人口（约 1905 万）13.5%；亚美尼亚基督教徒 104 万人，占当时帝国总人口的 5.5%；犹太人 21.5 万人，占总人口的 1.13%。1908 年帝国内希腊基督教徒 280 多万人，占帝国总人口（约 2095 万）的 13.4%；亚美尼亚基督教徒 105 万人，占当时帝国总人口的 5%；犹太人有 25.6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1.22%。1914 年帝国内希腊基督教徒近 180 万人，占总人口（约 1852 万）9.7%；

^①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792 - 1923*,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7, p. 11.